

哲学家肖像——伊林·费切尔

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

——记德国著名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切尔

金寿铁/文

关键词：马克思；更美好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劳动批判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一、德国老一辈政治学家、著名马克思学者

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德国老一辈政治学家、著名马克思学者，生于德国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1928—1932年，费切尔就读于德累斯顿小学，随后毕业于国王乔治人文中学，并在一所翻译学校深造。1940—1945年，他服兵役，曾任炮兵少尉。

从英国战俘营获释后，他最初学习人类医学，随后在图宾根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哲学、日耳曼学、罗曼学等。1949—1956年任图宾根大学助教，1957—1959年任斯图加特大学讲师，1950年以《黑格尔人的学说》为题获得博士学位，1959年以《卢梭的政治哲学》一书获得大学授课资格。1963年他被聘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直到1987年退休。1968—1969年费切尔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客座教授、1972年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荷兰瓦森纳继续深造学院客座教授，1976年任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77年任美国哈佛大学欧洲研究学院客座教授，等等。

费切尔是当今德语国家政治学的巨擘。费切尔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和思想史，其学术活动的重点是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特别是欧洲马克思主义思

作者简介：金寿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外聘教授。

潮的不同维度。费切尔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他最著名的著作当属《从马克思到苏维埃意识形态》（1957年）、三卷本手册《马克思主义》（1963—1968）。1985年，费切尔与H.闵克勒一同着手编辑一部规模庞大的五卷本出版物：《政治思想史》（《皮珀尔政治思想手册》）。

二、“原来马克思是正确的”

作为德国政治学的老前辈，费切尔长期担任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他不仅是一位研究马克思、黑格尔、尼采、卢梭以及童话和老年人问题的学者，而且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位严谨的、传统意义上的党内思想家。

应该说，费切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富于启发意义的：他毕生致力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问题，论证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成年著作之间的连续性，特别是他直面当代西欧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演进，精辟概括了西欧非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特点，敏锐地指出了前苏东“正统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和错误，乐观地展望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扬弃了异化的、有人类尊严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费切尔“不是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某种异己的、生僻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完全是外来的学说，而是把它当作还能给我们提出重大问题的一种学说，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处境的一种学说”，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立场和治学态度，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硕果累累。例如，他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版》影响了西方整整一代大学生。

2004年，他的扛鼎之作《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版》，第五卷：预测与乌托邦》隆重问世，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本卷含有令人惊异的预测文本，特别是含有关于马克思的预测本文。这部著作使得他的多卷本《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版》成为全新经典版。

在文集《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研究》^①中，我们可以发现从70年代到当代的文本。在此，一再返回的研究主题是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和生态问题。在“生态马克思主义”（Ökomarxismus）这一标题下，费切尔第一个辨认出了马克思著作中对生态问题的忧虑和研究向度。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版》第五卷^②中，他总结性地概括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部分。

^① 伊林·费切尔：《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研究》，米洛版莱纳出版社2007年。

^② 伊林·费切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版》，第五卷：预测与乌托邦》，柏林，建设袖珍出版社2004年。

根据费切尔对马克思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考察，马克思一再重复并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性作用，但是，他显然确信，只有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形式”才能够保护和保持人的生存的自然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以农业生产为例，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的这种破坏性作用：“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和中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费切尔发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使人性的生存自然基础与人类对自然的新的态度协调一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它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因此，我们必须把自己从一个“无节制发展”(Exzessen) 的社会中解放出来。那么，究竟应从哪方面着手呢？恰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剩余价值理论》中，费切尔发现了借以摆脱这种“无节制发展”现象的诸多主题。

费切尔坚信：“原来马克思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重又复兴，风靡欧美乃至全球？归根结底，《资本论》揭示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因此，想要正确理解当下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我们就绝对无法绕过《资本论》这一鸿篇巨著。目前旷日持久的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就是 70 年代那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翻版，其危害甚至比 30 年代那场世界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和《资本论》在当今世界中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是当下工人运动还是烛光示威，都是旨在通过社会共识和民主实践克服不合理的社会矛盾，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资本论》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高经典，能够成为指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科学武器。

正因如此，当他目睹法兰克福大学的马克思研究复兴时，他就由衷地欢欣鼓舞与振奋：“阅读更多的马克思吧！”

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费切尔既是一个自我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的范例，同时也是一个最尖锐地批评苏维埃制度的范例。

“苏联滥用了马克思。”他早就知道这一点。1957 年他率先发表了题为《从马

克思到苏联的意识形态》^③ 的研究论文，从此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上，开始转向“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unorthodoxen Marxismus）。前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滥用马克思之名，玷污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但是，这种“滥用”和“玷污”无损于马克思思想的光辉，也不能抹去人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像罗莎·卢森堡、恩斯特·布洛赫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费切尔也忠于青年马克思的民主理想，把一个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扬弃了异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看作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他那里，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循环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民主。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天才地预见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之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他把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但是，历史业已表明，社会进步是一个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并不存在从资本主义到“自由王国”的大跳跃。在费切尔看来，马克思未免高估了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并且在过去的市民革命与预言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构思了一个错误的类比”。因此，费切尔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另辟蹊径，寻求内在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革命”（ein Drittes）。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逐步的社会转型方式，即把改善一切人的生活条件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巨大的技术发展成果，并且认真思考缩短劳动时间问题。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更多的时间用于创造性的、内容充实的活动。”这方面的措施有：缩短劳动时间，接受高等教育，超越工资劳动的强制性禁闭，开展令人满意的娱乐活动。劳动不应该是沉重的、身心俱疲的负担，而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娱乐活动：“如果人们都像孩童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那么强制性的禁闭劳动也就被摧毁了。”这似乎有点天真的乌托邦味道，但是，在《神圣家族》中，作为这方面的实例，马克思曾把“作曲”称作一种内容充实的活动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抱有一种改变社会的强烈愿望，因为这种改变不是自行完成的。

正是出于这一理念，如今耄耋之年的费切尔不愿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而是愿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传承马克思主义的火炬。作为一个“晚期公民”（der späte Bürger），如今他“致力于吸收和保存市民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对于研究某种随后的社会形态具有重大意义的精华。”^④ 就此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劳动批判”（Arbeitskritik）成为他经常讨论的话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张小简）

③ 伊林·费切尔：《从马克思到苏联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美因 1975 年。

④ 参见罗尔夫·威格豪斯：《马克斯·霍克海默导论》，汉堡，尤尼乌斯出版社 1988 年，第 38 页。

论战后德国的马克思、 黑格尔和批判哲学

——与伊林·费切尔的谈话

[美] K. B. 安德森/文 金寿铁/译

提 要：本文包括采访者关于伊林·费切尔生平和著作的一个导论以及与费切尔的一次谈话和注释。在采访中，费切尔讨论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以及他的阿尔都塞批判。费切尔是当今有关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著名的德国专家，在这次谈话中，他首次详尽讲述了自己对政治学和马克思学的独创性学术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批判理论；结构主义；民主；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一、导 论

伊林·费切尔，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解释者之一。对战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大众来说，他的名字就像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其他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一样，如雷贯耳，几乎无人不晓。费切尔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 30 载，他的著作向我们显示了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即不是迂回从事文化批判而是更直接地从事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费切尔的著作吸收并回应阿多诺的作品以及他的同时代批判理论家的作品，并且发展了 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的黑格尔的

作者简介：K. B. 安德森（Kevin B. Anderson），哲学博士，美国普渡大学政治系教授，列宁哲学研究专家、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专家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考证版（MEGA2）研究人员。

马克思主义。

1922年，费切尔生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大部分时间在东部前线度过。他是在战争期间首次阅读马克思著作的。1945年5月，在战争结束的前几天，党卫军袭击了他的家，父亲惨遭杀害。战后，当他攻读图宾根大学研究生时，他开始精读黑格尔和马克思。40年代后期，在法国研修期间，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卢西安·戈尔德曼^①取得了联系，并接触了亚历山大·科耶夫^②、让·伊波利特^③等人的思想。他关于黑格尔哲学人类学的博士学位论文（1950），后来以《黑格尔关于人的学说》为题得到出版^④，随后他开始研究《精神哲学》，即黑格尔《哲学全书》体系的第三卷，也是最少被讨论的一卷。

完成博士论文不久后，费切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成员，从而成为西德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注释者。《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份在新教教会资助下，由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杂志。5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具，这份杂志曾在德国激起了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广泛辩论。在前希特勒时期，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和其他一些人发起了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早期讨论^⑤，但是，这一讨论不仅由于希特勒上台，还由于斯大林的漠不关心或对青年马克思的敌意而被中断。1960年，费切尔发表了一部半自传作品，在此，他注意到了他50年代的作品构成一种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尝试，“即试图从社会学和批判视角分析从青年马克思到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发展及其瓦解：从这一分析中浮现出一幅悲剧性变化的图像，即从一种人道主义观点到一种反人性结局的变化图像。”^⑥在这篇文章中，他已经与另一个左翼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贝马斯展开争论，对他的马克思解释提出了异议。这个时期，他也开始拓展了日后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那个独特立场。

① 卢西安·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7—1970），法国哲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人文科学与哲学》、《隐蔽的上帝》、《辩证法研究》、《保卫一种浪漫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等。——译者

② 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生于俄国，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了题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的论文。——译者

③ 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 1907—1968），法国哲学家，以拥护黑格尔著作而著称，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与黑格尔》——译者

④ I. 费切尔：《黑格尔关于人的学说》，斯图加特：弗里德里希·弗罗曼出版社，1970年。

⑤ H.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载于《批判哲学研究》，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2年，第1—48页。

⑥ I. 费切尔：《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土生子的重新发现》（1960），《眺望》，7月/9月，第89页。

这些年间，费切尔著作的顶点是 100 页的文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这篇文章初版于 1960 年，后来，又作为他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核心部分再版。他的早期著作不仅吸收黑格尔的人类学，还深受卢卡奇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他批判了大多数青年马克思解释者过分强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作用。“一般而言，注视者仅仅关注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当然，在拒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发生过一定影响，但是，他们恰恰忘记审查这一点，那就是，马克思的人类图像在其本质结构上早已存在于黑格尔之中。”^⑦ 费切尔并非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存在一致性，然而，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事实上正是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的地方：“马克思并没有接受黑格尔把人类与‘主体精神’视为等同的做法。因为对他来说，人类是一个血肉之躯。”^⑧

在这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文章中，费切尔也明确地批判了他视为是恩格斯著作中实证主义的因素，在恩格斯那里，“科学的两种概念（即黑格尔的概念与实证主义者的概念）仍然以奇特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而作者却对此浑然不知。”这导致这样一种严重局面：“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后来的哲学家们完全丧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组成部分。^⑨ 尽管费切尔称赞列宁的《哲学笔记》开启了重新连接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之间的过程，但他认为，列宁无所不包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缺乏马克思辩证法的想象力，究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先锋队党的非辩证法概念使然。对于费切尔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和柯尔施是更恰当地连接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在费切尔的众多文章中，“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是人们援引最多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也出现在《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努力追寻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的具体路径。在他看来，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异化批判得到了最明确的展开，从而“只能根据马克思早期著作才能恰当地理解他的后期著作。”^⑩ 然而，在 1844 年，超越异化之路仍然含糊不清，而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被想象为一个辩证的总体，在这种总体中，对抗趋向于超越当下的社会条件，与此同时，这种超越被想象为是不可避免的。^⑪ 鉴于目前后结构主义的辩论，在此，费切尔也许注意到，不是把马克思的总体概念用作吸收一切个别性和差异的某种东西，而是用作内在地有区别的、事实上为深刻的对抗和矛盾所四分五裂的

^⑦ I. 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1967），J. 哈格里夫斯英译本，纽约：赫尔德尔与赫尔德尔出版社，1971 年，译文略有变动。

^⑧ I. 费切尔：同上，第 55 页。

^⑨ I. 费切尔：同上，第 63 页。

^⑩ I. 费切尔：同上，第 24 页。

^⑪ I. 费切尔：同上，第 19 页。

范畴。

在费切尔的一系列后期著作中，这些主题得到了详尽阐述和进一步发展，这些著作包括他正在进行中的黑格尔研究（1971）^⑫，他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持续研究（1965）^⑬。此外，在他的有关其他话题的著作中，这些主题从卢梭（1975）^⑭进入意识形态，进入反核运动（1986）^⑮，进入他最近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著作（1991）^⑯。20多年前，费切尔就已经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要性，他写道：“即使马克思没有预言《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一个世纪之后资本主义持续生产会导致的一切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和资源耗尽等最致命的生态问题），那他也至少预见到，通过他那时所设想的那种社会模式会更好地、更容易地解决这一问题。”^⑰

费切尔在他最近的著作《人类幸免于难的条件》（1991）中，通过回溯马克思、恩格斯、恩斯特·布洛赫^⑱、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当代作家的生态学著作，从理论上追踪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问题。他重新解释诸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瓦尔特·本雅明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一类的现代文本，批判社会主义运动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不加批判的盲目支持。费切尔强烈控告当代工业文明境况，并且认为，我们面临着必须迅速改变我们目前工业文明的局面。他写道，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建立一种生态学上平衡了的“替代性文明”，我们将不仅面临“核毁灭”的危险，而且面临一种极权主义的、自给自足的“生态专政”的可能性。^⑲他并没有把马克思描写为一位尚未封号的前卫生态学家，不过，他把马克思描写为一位分裂的思想家，即他的著作既包含着一种成问题的经济学的“发展乐观主义”，也包含着一种发人深省的“生态学的意识”。^⑳关于东欧前共产主义政权，他认为，这种政权压制来自下面的“所有公众批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造成了甚至比西欧更糟糕的生态环境问题。^㉑费切尔同样严厉地批评了他所隶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摇

^⑫ I. 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J. 哈格里夫斯英译本，纽约：赫尔德尔与赫尔德尔出版社，1971年。

^⑬ I. 费切尔：《马克思自由概念的具体化》，载于E. 弗洛姆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纽约：双日出版社，1965年，第238—249页。

^⑭ I. 费切尔：《卢梭的政治哲学》，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75年。

^⑮ I. 费切尔：《致费赫/海勒的两封公开信》，《新日耳曼批评》37期，第58—72页。

^⑯ I. 费切尔：《人类幸免于难的条件》第三版，柏林，狄茨出版社，1991年。

^⑰ I. 费切尔：《马克思论人的本性》，《社会研究》40(3)，1973年，第467页。

^⑱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乌托邦的精神》、《唯物主义问题》、《希望的原理》、《世界的实验》等。——译者

^⑲ I. 费切尔：《人类幸免于难的条件》第三版，柏林，狄茨出版社，1991年，第7页。

^㉑ I. 费切尔：同上，第106页。

^㉒ I. 费切尔：同上，第233页。

摆不定以及对其他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②

费切尔试图拯救布莱希特^③称作“伟大的方法”的东西，他的著作始终致力于从那些误解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庸俗化的人们中拯救马克思主义。他毕生的作品尤其聚焦在“从教条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分离马克思的批判思想”。^④东欧和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瓦解之后，并没有导致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所希望的结果，即这种社会向左转，以至于诸如阿尔布雷特·维尔默（1993）^⑤一类的左翼哲学家撰写写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形式都死了，而且，实际上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死亡。费切尔的著作向我们指出一条不同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架构和重新思考，使之成为一种人道主义。这样一种重新创造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回应目前的问题和辩论。但是，这并不是整个故事。由马克思的后继者发展一种范畴再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关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费切尔争论说，“就像所有伟大思想家的情形一样，他的著作的解释故事也是一种错误的解释故事。”^⑥

前苏东共产主义瓦解之后，费切尔与西方其他著名马克思学者，例如尤金·卡门卡和伊曼努尔·瓦勒斯坦一道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MEGA）学术咨询机构，这是适当的。今天，这部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始于1975年，由莫斯科和东柏林的正统共产主义者发起——在经历了1989年以后的一些严重困难之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重新倡导下继续编辑出版。

这次访谈是在法兰克福费切尔的家中进行的。

二、谈　　话

问：我有一个与60年代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有关的问题。例如，1967年曾有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次讨论会。您参加了会议，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② I. 费切尔：《今日德国社会民主》，《新政治》19期（春季号），1995年，第143—151页。

^③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现代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主要作品有《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他的孩子们》、《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译者

^④ I. 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1967），J. 哈格里夫斯英译本，纽约：赫尔德尔与赫尔德尔出版社，1971年，第IX—X页。

^⑤ 阿尔布雷特·维尔默：《最终游戏》，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93年。

^⑥ I. 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1967），J. 哈格里夫斯英译本，纽约：赫尔德尔与赫尔德尔出版社，1971年，第25页。

特^㉗、奥斯卡·内格特^㉘发了言，还有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和^㉙尼克斯·普兰查斯^㉚也发了言。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似乎是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有趣的方面：真实地走进马克思，充分利用批判理论的某些洞察力。然而，它似乎从未得到德国以外的更多的倾听。我认为，在此您相当出色地回答了普兰查斯，但是，从国际上看，正如路易斯·阿尔都塞一样，以后普兰查斯变得更重要。

我想起您或许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问题，可是，直到很晚，我也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想起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曾告诉我，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马克思塑造成过于天真的形象，这使得马克思变成鸡尾酒会上的谈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足以做出这种陈述。通常，我认为，甚至在法兰克福（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而是其他学派的人们）也深受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的影响，并且受到他们的某些范畴，特别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等等概念的影响。我并不认为，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任何进步或者使马克思主义批判可适用于现代社会。我认为问题在于，1967年以后从未出现过一次首尾连贯的辩论。那时，我携同出版社（它提供全部资金）组织过一次讨论会。但是，我们从大学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持，大学允许我们利用一所讲堂，仅此而已。后来出现了一种分化性演变：以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人们为一方，以受到阿尔都塞影响的人们为另一方，也许还有受到安东尼·葛兰西影响的第三方。60年代、70年代甚至以后，葛兰西都很受欢迎。当然，甚至某些保守主义者也接受了葛兰西，因为他的各种范畴可以无限制地应用于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我认为从未有过一以贯之的辩论，这是真的。1967年，我们甚至遇见两个东德人，一个是代表东德政党的奥托·赖因霍尔德^㉛，另一个是来自莱比锡大学的勉强够格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辩论十分滑稽可笑，因为他们与欧内斯特·曼德尔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批判性辩论。我想起，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托洛茨基主义者、东德人（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聚集在一起的唯一场合。在辩论中，我试图做点外交努力，因为我希望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不希望彼

^㉗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 1931—），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经是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学生并以关于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概念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译者

^㉘ 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 1934—），德国哲学家和传统批判理论中的社会理论家，著有《没有无社会主义的民主》、《寒流》、《康德与马克思》等。——译者

^㉙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 1898—1967），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生于奥匈帝国的利沃夫城，著作《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等。——译者

^㉚ 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36—1979），希腊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家，著有《国家权力与社会阶级》、《国家，权力，社会主义》等。——译者

^㉛ 奥托·赖因霍尔德（Otto Reinhold），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理论家，1989年2月27日曾发表演说，谴责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译者

此大喊大叫。这种努力奏效了。我之所以认为曼德尔与东德人及其亲苏联的立场之间的辩论滑稽可笑，是因为这种辩论与他们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的那个现实问题有些关系。东德人说道：有一种国家所特有的企业之间关系的市场。接着，曼德尔和其他人说道：要么企业归国家所有，即存在一种集体财产结构而不存在市场；要么存在某种市场而不再存在社会主义。我想起，这正是为中国和其他地方所讨论的东西，在那里，如今人们谈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一种属于同一所有者的即整个社会的那些企业之间关系的市场吗？因此，这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理论辩论，但事实上，这与东德生产率低下不无关系。来自莱比锡的那个人说得很清楚，在真正提高国家生产率方面，他们未曾获得成功。

问：您的一些学生，例如莫伊舍·波斯托纳是一个范例，还有，赫尔姆特·赖歇尔特也是如此。赖歇尔特写过关于马克思的一部优秀论文。^②

答：那是在我指导下完成的一部博士学位论文。

问：像施密特、内格尔一类的人们也跟您一起研究吗？

答：不，他们是独立的。

问：他们研究泰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吗？

费切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研究阿多诺，但首先研究马克斯·霍克海默尔。施密特曾是霍克海默尔的助手，而内格特一度是哈贝马斯的助手，不过，他具有某种独到的起源。我以为，我是最自由的人。我并不追问人们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抑或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马克思主义。

问：您宽容吗？

费切尔：我宽容。我对有原创性的人们感兴趣。可以这么说，有时我忍俊不禁，因为波斯托纳固执地想弄清楚霍克海默尔和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永远都不知道，我是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持有充分的论据。这一点之所以很有趣，是因为我以为他查明了十分重要而新颖的东西。的确，无论阿多诺还是霍克海默尔都没有接受人们关于他们的评价。哈贝马斯勉强同意人们对他的评价，但他对马克思的深度解释不是很感兴趣。

问：在您指导下完成的波斯托纳的论文也是这样吗？

费切尔：是的，不过，在出版之前，他花了很多时间重写这部论文。我认为，这部书现在变得更好，但是作为一部博士论文，它已经出类拔萃。

问：除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小册子之外^③，法兰克福马克主义的主要理论

^② 赫尔姆特·赖歇尔特：《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附伊林·费切尓前言》，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1970年。

^③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历史与结构：关于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结构理论的文章》（1971），J. 赫弗英译本，坎布里奇，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

家均没有真正回答阿尔都塞，他们做过回答吗？

费切尔：一开始，我被邀请写一本关于阿尔都塞的书，但我受够了与之打交道，而且，不知怎的没有写这本书。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对讲法语、西班牙语的世界的重要性。例如，这对拉丁美洲十分重要。

问：在美国，也很重要。

费切尔：我有几封来自美国的书信。这些书信问道：“阿尔都塞怎么样？”我试图理解他为什么做他做的事情。我认为，他想把马克思理论转变成法国传统科学概念意义上的一门真正的科学理论。然而，在我看来这讲不通，因为马克思理论是某种不同的东西，这当然与他的德国背景有些关系。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千方百计想要把现实的马克思转变成一个法国思想家，并且以那种方式做一切事情。

问：几乎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费切尔：一个实证主义者，是的。有时变得滑稽可笑。如果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导致个人以特定方式行动，那么阿尔都塞就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发现，而且应当如此这般地始终保持不变。事实上，马克思曾经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想要废除这种阻碍人类发展的沉重的结构性障碍。阿尔都塞甚至看不见这一点。我也想起他的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主义应当变成人人可利用的一门科学，但是，同时我们还应当拥有基于革命政治活动的那种意识形态。这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相距甚远。顺便说一句，我有个中国学生，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书^㉓，他送给我一册德文节本，并要求我撰写导言。这是在中国。他是上海的一个教授。在这篇导言中，我批判了苏联把意识形态用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切都用作意识形态。我认为，那不是马克思用语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应放弃批判方面。

问：我很想问您一些关于马尔库塞的情况，特别是他的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即《理性与革命》（1941）。^㉔ 我很惊讶，在德国的马尔库塞讨论中，很少提及这本书。

费切尔：那是真的。他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单向度的人》（1964）^㉕ 倒是有许多得多的讨论。他关于弗洛伊德的另一本著作《爱欲与文明》^㉖ 有两个德译本。

问：甚至在您的书《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冗长一章中，您也没有讨论马尔库塞。

费切尔：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否因为马尔库塞的黑格尔背景而怀疑他。而

^㉓ 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译者

^㉔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

^㉕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4年。

^㉖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5年。

且，这本书尚未译成德文。

问：我无意从您的个人方面，而是从德国知识分子方面表达问题。

费切尔：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特别是阿多诺与马尔库塞保持其距离。阿多诺这样做，首先是因为他不喜欢马尔库塞的广阔的民主视野。我记得，在大学电梯上见过一次阿多诺。我在报纸上写过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在最后一段话中，我写道：有人说法兰克福学派远离实践政治，但实际上，马尔库塞对今日问题很感兴趣。阿多诺大为光火。他告诉我，马尔库塞想把每一个洗衣女工都变成一个社会的董事或诸如此类的人物。我想起，阿多诺不知不觉地利用了列宁的公式：“每一个厨师都应当学会管理”。在这一争论中，阿多诺显然是精英统治论者。他从未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但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主张精英统治论的人。一个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倡导个人主义的人。他有点勉强地接受马尔库塞为战友。哈贝马斯在一篇文章（发表于1968年）^⑧中，与马尔库塞进行过一次辩论，这次辩论属于阿多诺传统。尽管我并不完全相信马尔库塞所谓大学生运动与第三世界运动结合的思想，但我能理解这种思想源自何处。这一点相当有趣，因为我曾经是爱德华·斯普兰格尔^⑨教授的助教，而这位教授曾经是狄尔泰团体的成员。

我认为，就下述说法而言，马尔库塞有很深的狄尔泰背景：他说，人们必须明白正要发生什么和接受什么，或多或少指出，在一定文化中，在一定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因此，我甚至赞扬马尔库塞冒错误危险。他所感兴趣的是，把社会转变成一种更人道、更自由的社会。他寻求能够成为这种转变动力的主体，他确信，美国工人阶级不再是转变动力，他也不认为这个动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像德国一样的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那么，推动力会是什么？于是，中产阶层大学生便是非人的社会的一种否定力量，是他们所谓“永无止境地竞争”（the rat race）的东西。^⑩ 他说，一种革命力量是中产阶层大学生；另一种革命力量是社会局外人。普通无产者不再位于革命舞台。我或许认为，这种观点是乌托邦的、错误的，但它却是招人同情的。

我与卢卡奇也有过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当卢卡奇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时，他说，他十分尊重阿多诺，把他视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家，但不幸的是，阿多诺对

^⑧ 于尔根·哈贝马斯编：《对马尔库塞的答复》，法兰克福/美因：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68年。

^⑨ 爱德华·斯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 1882 – 1963），德国教育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狄尔泰的学生，著有《生命形式》、《青年心理学》等。——译者

^⑩ 英文短语：rat race，字面意思是老鼠之间你死我活的竞赛。通常用来形容毫无止境并且没有意义的追逐，就像是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般，不管在迷宫或是滚轮上如何角逐，毕竟只是实验室中的实验品，终究还是徒劳无功。rat race一语除了指老鼠之间，打的鼻青脸肿，非得争出胜负外，也用来比喻人与人彼此勾心斗角的情形——译者。

转变现实社会极端悲观，以至于他生活在“深渊大酒店里”。^⑪ 您知道，除了对贝拉·巴托克^⑫的批评之外，卢卡奇喜爱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⑬ 卢卡奇说到，巴托克不是流行音乐家而更像是民主音乐家。表面之下，卢卡奇当然是一个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您不会批评巴托克。当然，您会批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⑭，或许他过高评价了阿诺尔德·勋伯格^⑮，但是，巴托克应该被视为勇敢无畏的。然后，我问他对马尔库塞的看法，卢卡奇说道：马尔库塞当然没有像阿多诺那么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民主革命者更招人喜爱。而且，在某一点上，我会同意他。

问：在德国，比起马尔库塞，人们把卢卡奇视为对黑格尔、马克思更感兴趣的人。

费切尔：或许是这样，但我拿不准，因为我知道，后期卢卡奇的著作《理性的毁灭》^⑯ 并非真得十分出色。关于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⑰，我很早就读过1948年瑞士版。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我读这本书，并且，那时还到图宾根大学泰奥多·海宁教授那里谈起过这本书，不幸的是，这位教授成了一个纳粹分子，但是，他是一位写有三卷本《青年黑格尔》（1929—1938）的黑格尔学者。尽管海宁对卢卡奇很热心，但是，他对恩斯特·布洛赫稍后发表的黑格尔的著作《主体—客体》^⑱ 更热心。我认为，他发现（他可能是对的）布洛赫是一位更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而卢卡奇是一位更富于学者风度的思想家。无论如何，在《青年马克思》中，卢卡奇所谓黑格尔思想中法兰克福学派危机的东西乃是一项重要的发现。作为

^⑪ 格奥尔格·卢卡奇：《序言》，载于《小说理论》（1962），A. 波斯托克英译本，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2页。

^⑫ 贝拉·巴托克（Bartók Béla Viktor János, 1881—1945），匈牙利现代作曲家、钢琴家，民间音乐学家，主要作品有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舞剧《奇异的满大人》，乐曲《舞蹈组曲》、《弦乐打击乐与钢片琴的音乐》、《乐队协奏曲》，三部钢琴协奏曲，六部弦乐四重奏等。——译者

^⑬ 泰奥多·阿多诺：《现代音乐哲学》，A-G. 米歇尔与 W-V. 布洛姆斯特英译本，伦敦：拉希德与沃德出版社，1973年。

^⑭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o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美籍俄罗斯作曲家。主要代表作为早期三部舞剧音乐《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舞剧《婚礼》、《普尔钦奈拉》、《阿波罗》、《竞赛》，歌剧《俄狄浦斯王》、《浪子的历程》、《普西芬尼》、《诗篇交响曲》、《三乐章交响曲》等。——译者

^⑮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年），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乐队变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华沙幸存者》、歌剧《摩西与亚伦》等。——译者

^⑯ 格奥尔格·卢卡奇：《理性的毁灭》（1954），P. 帕尔默英译本，新泽西：人文学科出版社，1971年。

^⑰ 格奥尔格·卢卡奇：《青年黑格尔》（1948），R. 利文斯通英译本，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5年。

^⑱ 恩斯特·布洛赫：《主体—客体》，柏林：建设出版社，1949年。

一部关于黑格尔思想发展的研究，我认为，卢卡奇的这部著作的确是重要的。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谈的是一个不同的话题。在此意义上，他与卢卡奇并不矛盾。早在苏维埃时期，卢卡奇就撰写了这本书，但是，那时他无法付诸发表。

问：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书就是1952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吗？

费切尔：在1949—1950年间。这是关于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书，即黑格尔《哲学全书》三卷中的《精神哲学》^{④9}。

问：这部书最终发表了吗？

费切尔：是的，20年后，于1970年。那时，我的老师是爱德华·斯普兰格尔，他对我们称作人文科学的心理学^{⑤0}很感兴趣，而且，这也是他个人的心理学，但是，我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他要我比较分析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所以，我写了约300页的关于黑格尔的文字和20页的关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的文字。不过，当我发表本书时，我删去了20页。斯普兰格尔死了7、8年，所以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这本书不是写心理学而是写黑格尔的。我以为，这依然相当有趣。那时，我深受亚历山大·科耶夫和让·依波利特的影响。40年代后期，我曾在法国学习。

问：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一再告诉我，你早先曾信奉路德宗。

费切尔：是，那是对的，但是，这纯属偶然。那时我是个小助教，报酬微薄。你简直无法靠这点报酬生活，那时，“福音研究会”〔Evangelical Study Group〕是德国海德堡的新教徒组织。他们希望设立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委员会，因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日内瓦中心要求他们这样做。这样，他们就设立了这个委员会，由埃尔温·梅茨克率领，不过，他上任两年后就死了。在那些成员中，我是最年轻的一员，其他人都是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只有一个人是经济学家。于是，我们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usstudien），我是三卷或四卷的编辑^{⑤1}。在此，我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的某些章节原原本本地发表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西德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部严肃认真的文献。那时，马克思或多或少是禁忌。我记得，我在东德莱比锡有个朋友，我请他给我寄几本书。这可能是两德大分裂以前的事情。他写信告诉我：“但愿您不是被迫阅读这些书。我们不得不阅读这些书，但我们并不喜欢它们。”这总是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如

^{④9} G. W. F. 黑格尔：《精神哲学》，W. 瓦拉塞与 A. V. 米勒英译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

^{⑤0} 一种基于狄尔泰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心理学研究，关于斯普兰格尔与狄尔泰关系的背景，参见，H. P. 雷克曼：《威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的先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学出版社，1979年。

^{⑤1} 关于背景，参见 I. 费切尔：《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土生子的重新发现》（1960），《眺望》，7月/9月，第84—92页。

果您被迫阅读某种东西，您就不再有兴趣做这件事情。

问：您是哪年出生的？

费切尔：1922年。

问：您在战争中，参加过战斗吗？

费切尔：当然，当然。

问：刚刚走出战争，什么东西唤起了您对马克思的兴趣？最初，您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发生兴趣的？

费切尔：我可以告诉您。这当然是一个混合物。我并非心血来潮，仿佛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马克思。当我在比利时当兵时，我购买了一卷马克思《资本论》节选版。这是我最初遇见马克思，但是我阅读法译本很吃力，我以为永远都读不完它。遗憾的是，我已经遗失了这本书。我记得很清楚，这本书附有一张马克思的照片。但是，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占领比利时的德军的一名士兵，而不是在东部忙于作战，所以有时间阅读这本书。我跑遍了很多很多书店，我想，如果想大获成功，就应该阅读些学术方面的书。我从不以为，这或许危险。

我义无反顾，不假思索。我把这些书带在身边，后来我把它们留在了家里。在战争期间，我没有把这些书带在身边，那太多了，实在不堪重负。过了很久，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重新遇见马克思。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有很多图书，但是，唯独没有马克思的图书。他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书并不会出现在一个德国中产阶级的图书室里。弗洛伊德的书很容易得到，我很早就阅读了弗洛伊德，但直到战后，我才开始阅读比较容易理解的德文版马克思作品。我从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入手，这些作品有《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我很早就在一份青年杂志上撰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导言，标题叫“未来”（Zukunft）。那是在1946—1947年间。我记得，有个朋友问我：“您能指给我一本浅显易懂的入门书吗？”我还有一个朋友叫恩斯特·赖芬贝格（不幸的是，他已经去世），他是德国犹太心理学家，他曾在法国军队中战斗，并活着回到德国。他曾在图宾根大学精神病院主任恩斯特·克雷策默尔（1888—1964）手下当过助手，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精神病科医生。作为一个流亡法国的德国学者，赖芬贝格深受法国共产主义哲学家乔治·波利泽^{⑤2}的影响。他很熟悉弗洛伊德、马克思和波利泽的著作，并且引导我去阅读最初的图书。

我想起，在阅读《资本论》之前，我看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⑤3}

^{⑤2} 乔治·波利泽（Georges Polizer, 1903—1942），匈牙利出身的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著有《心理学基础批判》、《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等。——译者

^{⑤3} 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R. 利文斯通英译本，坎布里奇，马萨诸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年。

当然，对于我来说，开始阅读黑格尔之后，有一点非常重要、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解释方式。在我理解他关于列宁的政党理论之前，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他也许做得太多。他把它做过头了。我要说，他把列宁的政党理论思辨化了。他把它说成是一种绝对真理。当然，这种做法废除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任何一种现实的民主基础。然而，总的说来，卢卡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 1947—1948 年间。

然后，1948—1949 年间在巴黎，我遇见了另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卢西安·戈德尔曼。他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你跟他可以一连数小时谈论他对布莱兹·帕斯卡尔⁵⁴、让·拉辛⁵⁵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真的很引人注目。当然，亚历山大·科耶夫持有一种十分有趣的、原创性的黑格尔主义，而让·华尔⁵⁶则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让·伊波利特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者，他的饶有风趣的《精神哲学》译本乃是同一时期关于黑格尔著作的一种解释、一种翻译。我最近浏览这个时期来自斯普兰格尔的书信，他这样写道：“如果您身在巴黎，您就一定会喜欢上巴黎，并且不会读太多黑格尔。毕竟，巴黎美不胜收。”但是，事实上，我来到巴黎发觉，恰恰法国发现了黑格尔。这正是黑格尔在巴黎第一次稳操胜券的时候。那时，在伊波利特、科耶夫、华尔以及许多其他人之间进行着一场热烈的辩论，他们对我热衷于黑格尔并不感到惊讶。对黑格尔感兴趣是十分正常的。甚至这里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耶稣会会士加斯顿·费萨尔德⁵⁷，他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这是相当罕见的。那时，他牵涉的困难很大，因为就像斯大林是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一样（笑），教皇（庇乌斯 XII）也是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与教皇不同，费萨尔德神父曾经是一个流亡英国的反纳粹成员。1948—1949 年间，他为了免遭迫害，退出了黑格尔辩论的第一线。但是后来，教皇死后，他又回来了。他以一种黑格尔方式写了一部相当有趣的关于伊格内修·洛约拉（Ignatius of Loyola）的解释。为了证明他自身的黑格尔主义，他试图证明圣·伊格内修·洛约拉早就是（笑）一个不自觉的黑格尔主义者。

问：您没有提到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在那个时期乃至后来，这些手稿对于您都特别重要吗？

费切尔：也许，在我阅读《资本论》之前，我就发现了这些手稿，或者说我遇

⁵⁴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 – 1662），法国 17 世纪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译者

⁵⁵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 – 1699），法国 17 世纪剧作家。——译者

⁵⁶ 让·华尔（Jean Wahl，1888 – 1974），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论黑格尔哲学意识中的苦恼》、《克尔凯郭尔研究》、《存在主义简史》等。——译者

⁵⁷ 加斯顿·费萨尔德（Gaston Fessard，1897 – 1978）法国耶稣会牧师、哲学家和神学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基督教和历史》、《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等。——译者

见了这些手稿。我与赖策尔特（Reichelt）等我的学生一道精读了《资本论》。在某种意义上，赖策尔特感谢阿尔都塞及其学派，因为即使他们错误地解释了《资本论》的政治重要性，他们也严肃地领会了这种重要性。我认为，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是一部不错的书。尽管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问：现在，我的最后问题与您在数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那个论点有关，在这封信中，您写道：在德国，马克思被视为一条“死狗”。

费切尔：不完全是这样，（笑）但几乎是这样。

问：您显然不同意，那么，您认为今天马克思的重要性是什么？

费切尔：两周前，我刚刚接受了一次无线电广播采访，我被询问的恰恰是同一个问题。他们说：“您研究马克思 20 载、30 载，但是，现在这不再是值得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消失。”我说道：“您知道，我从未相信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少不相信最后 30 年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的确不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在马克思所指的这种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⁵⁸ 其次，马克思的主要价值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社会的万能计划或万能钥匙。他几乎没有涉及这一点。他确信，人们不应深入研究未来社会的细节。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错误。他至少应该对民主、确保个人自由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它属于自由主义传统，他相信，只要废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大部分压迫，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所以，他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即他确信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自由社会的可能性，但是，他忘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即使经济剥削或甚至经济差异归于消失，在国家与市民之间、在旧社会与新社会之间、在受益不均的人们之间，也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对于个人、对于少数集团，有许多事情不得不借助于一些道德和社会机构的保证来调节。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他过度乐观了。

其结果，人们试图创造（也许，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条件下）一个苏维埃社会，毫无限制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创造一种官僚社会，假装这就是一种自由的社会。尽管如此，当我在我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收录于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1967》）中证明，马克思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官僚政治的批评家时，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官僚政治批判仅仅属于资本主义，而且，一旦我们不再拥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的危险就烟消云散了。我认为，这正是马克

⁵⁸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选集》第 6 卷，纽约：国际出版社 1976 年，第 506 页。

斯·韦伯^{⑤9}的一个正确论点：他不仅警告了面对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的危险，同样，也警告了面对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危险。

不幸的是，马克思在批判波拿巴主义形式中的最后官僚独裁形式之后，对这个问题不再抱有任何兴趣。他仅仅渴求展开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我经常批判恩格斯的哲学方面（参见费切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1967），但我认为，就对民主的理解而言，也许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实质。恩格斯赋予我们的未来政治秩序（无产阶级专政）以一种新的模式，即新英格兰殖民地及其自我管理。我认为，他对澳大利亚和北美殖民地的原创性的民主结构评价很高，这同样是汉娜·阿伦特^{⑥0}极力理想化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恩格斯特别关注的正是这种原创性的民主结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如果不是法国军队借助于普鲁士军队镇压巴黎公社，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然十分重要，但是，当然要考虑到自他逝世以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拥有多得多的具有跨国组织的更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所料想的东西今天甚至更真实：革命只有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同时发生才有可能成功。我们不可能仅仅在法国、德国，甚至仅仅在欧洲拥有一场革命。但是，那也会造成巨大困难。今天，恰恰因为这种跨国组织，我们甚至在一个国家里也无法（这是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维持任何福利国家类型或生态学上矫正了的资本主义。与许多中小型国家相比，这些跨国组织中的某些组织拥有一种更高的预算！我认为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家、作为一个方法论家依然很重要。当然，马克思绝对不会承认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他在 100 多年前所碰到的那些问题有什么区别。人们说，现在马克思比他在 20 多年前更重要，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的十分正确的。因为经济危机席卷世界，而且，也因为生态危机现在成为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⑥1} 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问题曾是次要问题，然而，马克思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轮廓。

（Kevin B. Anderson, “On Marx, Hegel,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in Postwar Germany: A Conversation with Iring Fetscher”, in: *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 50: 1 – 18, 1998 责任编辑：李理）

^{⑤9} M. 韦伯（Max Weber, 1864 – 1920），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译者

^{⑥0} H. 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 – 1975），原籍德国，美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代表作有《极权主义的因素与起源》、《积极生活》等。——译者

^{⑥1} I. 费切尔：《人类幸免于难的条件》第三版，柏林，狄茨出版社，1991 年。